

在台湾

周为筠／著
国学大师的1949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在台灣

国学大师的1949

周为筠／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前言

去过台北的人都该会被那些别致的街道名称所吸引，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从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名，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他在台湾除了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阳明山”，而这里的公园便顺理成章成了阳明山公园。

同时蒋介石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恍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蒋家王朝在 1949 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 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踟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傅斯年、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他们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

从此以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睽违阻隔，这些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只能做苦海望乡人，在满腹乡愁下度过余生。几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们逐渐被记忆和历史所尘封，消失在大陆人的视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遗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们在台湾还好吗？他们在台湾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作为大陆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历史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初，两岸关系逐渐解冻缓和，一些文化名人，在两岸关系的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作品、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琼瑶、三毛作品，伴随着邓丽君歌曲和校园民谣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人，许多大陆人也因此对台湾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其后流亡台湾的胡适、张大千、梁实秋、白先勇等，开始陆续在大陆各领风骚。

本世纪初连战、宋楚瑜和李敖相继“登陆”，大陆的“台湾热”常兴不衰，关注台湾事务的大陆民众也日益增多，但两岸长期形成的对峙和生疏绝非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怜。在“台湾热”的喧嚣中，这些研究国学的硕学鸿儒除了个别像胡适、林语堂、钱穆等，多数却不被大陆人所知晓，使得他们身与名俱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在这里我选取了九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呈现出这些去往台湾的硕学鸿儒的别样人生。他们深厚的学养固然让人高山仰止，我亦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现出他们从 1949 年开始的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书名取为《在台湾——国学大师的 1949》，其实不是很妥帖，因为文字里 1949 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笔墨的触角是深入他们在台湾的生活，这儿的“1949”更恰当解释是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后来想想黄仁宇先生《万

历十五年》也不单单是 1587 这一年的那些事儿，东施效颦后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过给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统一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想必读者总会以各种理由质疑。在如今这个浮华的年代，“国学大师”这顶帽子被滥用得满天飞，连季羨林先生都要请辞，所以称他们为国学大师总觉得是一个尴尬的媚俗称呼。他们流亡在孤岛，却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国学一脉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二

“国学”之谓乃上世纪初为区别“西学”而诞生，从它问世那天起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汹涌而进的西学新知冲决了国人内心的堤岸，知识阶层开始比较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国学”两字包括着泱泱中华的一切传统学术文化，维系着几千年的华夏礼仪文明，但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学的命运可谓起伏跌宕。

1895 年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割地赔偿，委曲求和，自此台湾被日本侵占长达 50 年之久。人穷则变，艰难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任由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局面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经打破，疆域总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李鸿章曾形容这个历史转折的经验是两千年来未曾有之大变局。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一个巅峰，新文化运动把国学批得体无完肤。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异彩纷呈，互相激荡。激进的知识分子深挖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的根源，他们在历史的记忆中翻箱倒柜，责问传统的体制与文化。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把国学无情地抛弃在一边，为新知识和新思想腾出空间。

1949 年治乱兴替，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披荆斩棘奔向前，国学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代名词，被予以割弃。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海峡的另一边——台湾。虽然两岸长年对峙分割，但

台湾却在文化上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传统的中国文化。时至今日台湾的国学依然发达，传统文化的香火依旧鼎盛。

台湾学校里一直沿袭了“国文”的称谓，汉字依然是使用了几千年的繁体字。中小学校注重国学教育，小学教育中，国文、历史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当年国民党当局定下的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让国学点点滴滴深入人们的生活。

而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国学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者与大陆的《高中语文》课本相似，后者《国学概要》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经史子集的概要性介绍；而《国学基本教材》的全部内容就是“四书”。

台湾国学得以传承，这些在孤岛“为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们”尤其功不可没，他们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在孤岛上保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带出一批批国学的衣钵传人。

如今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成了大陆无人能及的学界翘楚，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杜维明是享誉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作品在大陆影响甚巨，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学习陈鼓应书的于丹掀起一股“庄子热”……

正是这些国学大师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教育，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这样现代的古典演绎者，表演出《薪传》、《水月》、《九歌》这样生命的舞蹈；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这样深具韵味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这样著名的词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美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

三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的改革逐渐触及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深层，人们接受了社会变革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在社会结构急速变革的总体情势下，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整合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的价值观，意义的失落

使得社会秩序的清整变得困难重重。一些人开始重拾历史的碎片，寻找能够救赎世俗社会的工具。

人们跨过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走到新世纪的今天，才发现我们原来并没有走出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圈子，开始意识到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终于历史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轮回，被摒弃的国学以新文化保守主义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时之间，国学又成了香饽饽，重振国学的声音高涨。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成立“国学研究院”，接着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各个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班。还有推出“国学短信”的，手机用户每月交 10 元学费，就可以每天来上一段“子曰诗云”的“国学”短信课。以圣人孔子为名、传播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的走红，国学博客圈的建立都在昭示着新文化保守主义借尸还魂的思想运动趋向。在政府的支持下，祭孔活动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规模空前、舆论攻势强大。早在几年前鼓励少儿读经的运动就声势浩大，苏州两家私塾“菊斋私塾”和“复兴私塾”相继开馆，宣称传播中国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学馆”落户于武汉。2008 年斥资 300 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孔孟故里开始修建，把这场“国学热”推向了高潮。

历史似乎习惯跟世人开玩笑，当大陆开始“国学热”时，台湾岛内却开始“去中国化”。以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逢“中”必反，“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将“中”字头公司一律改为“台”字头，历史教科书中“国父”孙中山先生变成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讽刺陈水扁能否把儿子陈致中也改叫“陈致台”？

台湾推行“去中国化”，目前还只是伤及皮毛，没有动其筋骨，国学教育体系没有被完全破坏，依然保留着良好的传统。马英九上台后，开始有“拨乱反正”的新气象。台湾一些有识之士如余光中、许倬云等人纷纷发起成立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要求恢复过去的“国学强势竞争力”。

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南怀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是空中楼阁，精神家园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同，只有通过共享一个世代更迭的文化共同体，

我们才分明感觉到血浓于水。一个人可以通过整容把自己变得与同胞大不相同，却无法剔除血脉中的文化 DNA 链条。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往台湾的这些国学大师，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和瑰宝，缅怀他们的生命历程是对我们民族最好的礼敬。

周为筠于杭州

2008 年 4 月 4 日清明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	---

胡适：书生最后的闹与寂	1
-------------	---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乘桴浮于海的日子
半个台湾人
清算胡适的幽灵
万山不许一溪奔
政治文化围剿的靶子
在欢会中陨落
微笑的异端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33
-------------	----

深陷政治的漩涡
“抢救大陆学人”
归骨于田横之岛
元气淋漓满台大
身殉台大的最后时光
世间已无傅斯年

林语堂：“落根”有为有不为	61
---------------	----

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落根”有为有不为

洋博士成了国学大师
半个世纪的金玉缘
一团矛盾的八十自叙
幽默大师的落寞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

89

落花流水春去也
千斤担子两肩挑
文化一脉传南国
晚年居台获新生
枯桐欣有凤来仪
心犹余憾洗铅华
魂归故里，叶落归根

方东美：独步学坛的诗人哲学家

117

苦海望乡人
台湾因他才有哲学
独步学坛无敌手
出入中西的硕学通儒
在“党”外的“书呆子”
由诗心而入哲境
中华文化传灯不绝
乾坤一场戏，生命一悲剧

徐复观：擎起这把香火的勇士

145

学术与政治之间
临歧分手竟反目
半路出家的学界明星
无惭尺布裹头归
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
未谒孔陵为遗恨
一个农民的儿子

牟宗三：重建传统的儒家智者 171

风飘万点正愁人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宋明义理，魏晋人物
内圣外王的哲学典型
硕果仅存的新儒家
一生著作古今无两
一个时代的终结

陈鼓应：为民主浪迹天涯的新道家 199

失落的自我
追随自由主义斗士殷海光
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
“台大哲学系事件”
“参与独派活动的叛乱分子”
“投共附匪”的北大教授
为民主浪迹天涯
出入老庄的新道家
归于寂静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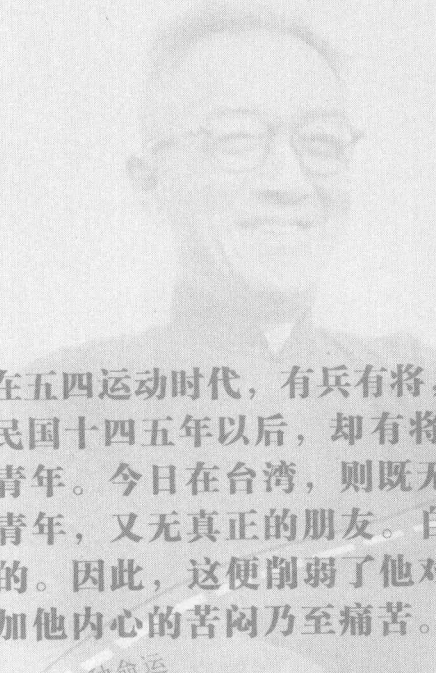
南怀瑾：经纶三大教的传奇隐士 229

乱世人生如飘萍
在台湾的困顿岁月
传奇经历越传越奇
欲为天心唤梦醒
从《人文世界》到老古文化
催生中国当代第一条合资铁路
大陆掀起“南怀瑾热”
“买票不进场”的人生

后记 259

胡适：

书生最后的闹与寂



胡适在五四运动时代，有兵有将，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今日在台湾，则既无兵，又无将，即是既无青年，又无真正的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对现实的。因此，这便削弱了他对现实发言的力量，更增加他内心的苦闷乃至痛苦。

一段隐秘的当代史 国学的另一种命运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1948年的最后一天，辞旧岁迎新年的夜晚，萧瑟的金陵古城干冷干冷的。随着国民党军事形势的一泻千里，四面楚歌的城内已是人心惶惶。南京失去了以往节日的喧闹，零星的鞭炮声把气氛衬托得分外凄凉。在这方曾上演过多少王朝兴废与帝王更迭的老城里，雕栏玉砌今犹在，又将是朱颜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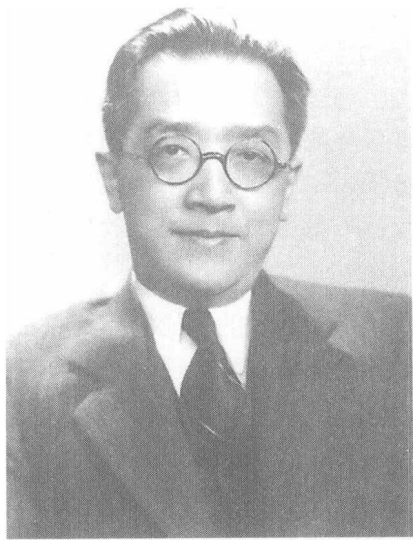
这个一年将尽的夜晚，胡适是与学生傅斯年一起度过的，他俩面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凄然对坐，凌乱的心绪平添了几分末世的哀婉，连发出一连串伤感往事的幽古之思。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心绪激荡地背诵着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飘零情怀让他们泪流满面。胡适反复吟咏着这首诗，并将它抄写在日记里。“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所有的一切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之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方，忠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也许胡适哀伤的不仅仅是国民党这个落幕的政权，还有他热切向往的渐进改良的变革之路，以及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的幻灭。在他整个后半生的日子里，这种穷途末路般的哀伤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胡适这时来南京赋闲已多日，他在自己新年第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他是1948年12月15日乘机撤离北平

的，之前蒋介石还派陶希圣北上请他回南京“临危受命”，让他组阁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而前面的翁文灏内阁已于 11 月中旬垮台。陶希圣赶到北平，在东厂胡同找到胡适，胡适当时还正忙着《水经注》版本展览，筹备北大 50 周年校庆的各项工作。陶希圣与胡适缠磨了两天时间，胡适还是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但他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胡适像

没过多少日子，北平在共产党的大军压境下成了一座孤城，蒋介石焦急之下先后两次电报催促胡适南下，并派专机飞赴北平实施“抢救学人计划”，胡适正是他要“抢救”的首要人选。而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12 月 14 日，胡适留下一纸短笺给北大同仁道：“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胡适临走时狼狈得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仓皇中只捡了父亲的遗稿和自己的著作手稿。

1948 年 12 月 17 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 50 周年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言语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 58 周岁生日，这次含泪的致辞竟成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场告别式演讲。

胡适其实并非什么政治人物，官僚衙门本没有他的份，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能体味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他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伟大的书生。从当年的中国公学到北京大学，他都倾注了十分的情感，校长这个位置也是他最为留恋的。早年的胡适是反对搞政治的，这点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虽然他曾将发誓“20 年不谈政治”的话

早就抛弃，不过“不入政界”总算一直在坚持。其中抗战期间胡适也做过几年驻美大使，这可以理解为在民族危亡时机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命运出一己之力。抗战胜利后，胡适还是皈依自己内心，回到他所喜欢的学术生活中。胡适自己认为和老乡陈独秀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在胡适的眼里，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政治”的牺牲品。

可是在胡适 40 年不衰的盛名之下，就像其弟子唐德刚形容的，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胡适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对国民党的净言和闲话也不少，他从来不畏惧当政者的高压，也不成心阿谀奉承地说顺耳话以作为自己晋身之阶以自肥。他追求温和的渐进式改良，对任何独裁政府都没有真正的好感，为民主自由而终身不懈努力。

蒋介石颇为倚重这位可贵的“过河卒子”，他借助胡适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独裁政权涂上一抹民主的色彩。1949 年 1 月 8 日，即将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请胡适到官邸共进晚餐，平日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破格以示敬意。也许正是出于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此乃传统士人的知遇与感恩的情节，也许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席间劝胡适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不过，蒋介石的话虽这么说，但弦外之音还是期望胡适这个“美国通”能够有所作为，国民党内部乃至美国方面希望胡适做大使的呼声一直很高，但胡适却连顾问性质的“国资委员”都无兴趣。果然不久之后，心存幻想的蒋介石还是写了封密信与胡适，明确表示目前急需美国在精神与道义上的支持，特别是注意对新生中共政权的不承认，希望胡适能协助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展开外交工作。



胡适与陈独秀